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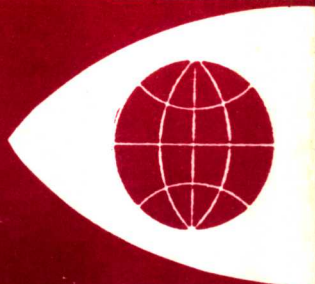


【美】墨子刻 著
颜世安
高 华 译
黄东兰

摆脱困境

——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宋代以后儒家学者寻求宇宙—人生问题的困境意识，不仅影响了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文化，而且影响着现代中国政治的发展。一部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在外强欺凌下救亡图存的历史，也是过去久远年代里绵延不绝的寻求道德根基的文化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

本书责任编辑委 姚大力

摆脱困境

——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美】墨子刻 著
颜世安
高 华 译
黄东兰

书 名 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编 著 者 〔美〕墨子刻
责任编辑 周文彬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金花园印刷中心
印 刷 者 南通韬奋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插页 2
印 数 4051—5050 册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2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0407-0/D·61
定 价 10.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借鉴与创造。为此，我社在优先出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关于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著作的同时，也适当选择一些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较有影响的著作出版。海外学者占有的丰富资料，他们的研究视角和某些方法，对我们认识中国的国情，评估中国文化的传统、心态及其前景，从而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的建设，都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当

然，他们的著作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甚至同我们存在着某些原则分歧，这是需要读者加以认真审察和辨识的。同时，任何借鉴都代替不了自己的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要靠我们自己从中国当代的实践中去概括和总结。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丛书只求为此提供某种有益的参照和比较。如果这套丛书能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将感到欣慰。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年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

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1988年

鸣 谢

我在本书中所作的研究，起始于在H·D·哈罗特南的友善鼓励下，写一篇考察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某些流行看法的评论文章。现在这本书仍然带有对这些看法进行分析批评的形式，而且它也没有融涵第一手和第二手的全部有关资料。无论还有多少不足之处，本书已经由于我针对许多学者的批评所作的多处修改，而获得了有力的加强。为此，我要真诚地感谢这些学者们，尤其是其中的艾恺(G·S·Alito)、R·N·贝尔拉、张灏、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傅乐诗(Charlotte Furth)、D·K·戈登、刘广京、刘燕龙(Yen-Lung Liu)、D·S·拉费特、马若孟(Ramon H Myers)、A·J·纳森、D·C·普赖斯、L·A·谢里顿、杜维明和F·小韦克曼。我还要感谢马若孟教授在我写作书稿的最初阶段所给予我的精神上的支持；感谢刘广京教授1974年6月15日在我家主持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讨论会，会上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促使我重新考虑我的各方面的观点；感谢张灏教授再一次

作为我的良师，对我多所指教。本书中的若干想法，来源于1973年至1974年我与G·杰克逊教授一起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开设的一门课程“传统与现代性在欧洲和中国”。这并不是说，所有这些著名学者都必然地赞同本书中的所有观点。其中有一些观点，与在中国意识形态转向西方的问题上推出的两项最出色的研究成果——张灏对梁启超的研究和本杰明·史华兹对严复的研究——并不一致，不过我从这两部著作中获益良多，仍然是十分明显的。最后，读者可能注意到，在我的研究中对唐君毅的著述有一种奇特的多样化的反应，有时对他提出批评，有时又把他当作权威加以引证。我至今仍在研究他的思想，但是我越来越深信，他的事例已经显示出人们在20世纪会如何地哲学化：为了追求对人的存在的普遍本质的探索，甚至宁可担当风险，去重申那些在一种文化中比在另一种文化中更受到珍视的观念。唐君毅所从事的冒险探索，迫使读者们跟随他一起这样做，证实了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是何等博学精深。

这项研究的较早一个写作稿，曾于1974年5月10日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地区性讨论会的春季会议上提出。

这个讨论会对我极其有益，它使我对于原来曾经忽略的那些问题有了更为明晰的看法，如果没有这次聚会，我可能至今都不能达到这样的认识程度。在参加1975年8月间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举行的，由美国科学研究委员会发起、杜维明教授组织的关于清初思想研究规划的会议时，我也领受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批评。此外我还从杜维明教授于1975年至1976年间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持的地区性儒家研讨会上，得到了很多的收益。

我还要特别感谢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对本书的出版所给予的支持，感谢纳森教授的厚爱和帮助。东亚研究所W·I·奥尔逊女士也对我极有帮助。我也深切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B·格隆纳特先生和文字编辑L·皮亚尔勒先生。文稿的相当一部分，是由L·J·休金斯和D·C·斯威特兰两位女士打印的。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苏珊·凯·墨子刻，在我备稿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她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T·A·墨子刻

1977年3月于特拉华州

目 录

导言 1

- 1 问题 1
- 2 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背景 3
- 3 基本方法论的思考 9
- 4 本书主要论点概述 14
- 5 方法论问题补论 18

第1章 依赖性与中国家族主义的人文理论 20

第2章 唐君毅的儒家自我完成的概念 27

- 1 导言 27
 - 2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29
 - 3 对体验的阐释 31
 - 4 道德自主 36
 - 5 感情化的、激烈的自我确认 38
 - 6 个人主义问题 41
 - 7 自主和权威 44
-

第3章	新儒家的困境意识	47
1	方法论思考	47
2	新儒学的目标是一个“活的东西”	58
3	绝对道德净化的目标	60
4	认识上绝对清晰的目标	62
5	一致性、控制和稳定性目标	66
6	普遍联系的目标	68
7	宇宙和政治力量的目标	74
8	欣乐与社会一体性的目标	76
9	最终目标与现实世界	77
10	作为实在的善的宇宙力量	78
11	精神的自然发展阶段	82
12	朱熹与精神发展阶段问题	89
13	王阳明与精神发展阶段问题	94
14	恶的既定力量	102
15	现实的人的干预意志	107
16	作为既定意志的宇宙	119
17	朱熹和王阳明	126
18	朱、王对形而上学与经验相互关系的主张	128
19	朱、王对精神修养的主张	130
20	朱熹关于普遍联系的主张	131
21	王阳明关于普遍联系的主张	137
22	朱与王论实践和政治行为的范围	144
23	新儒家的困境意识	147
24	清初的新儒家	150

- 第4章 新儒学与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文化 155
- 1 文化和腐败 155
 - 2 内外压力的聚合 157
 - 3 对腐化官员的谴责和惩罚 158
 - 4 内部的压力：行政的、哲学的、心理学的证据 160
 - 5 自主和领袖魅力 164
 - 6 三角模式的权威 166
 - 7 作为一种伪装角色的“君子” 167
 - 8 官僚的抗议 169
 - 9 官僚的精神 171
 - 10 官僚的实践和普遍主义 173
 - 11 普遍主义和皇帝权力 175
 - 12 权威、温和现实主义和激进主义 176
-

- 第5章 高涨中的乐观主义和西方化时代中相互依赖的精神
气质 179
- 1 西方化 179
 - 2 历史的惯性 181
 - 3 模棱两可的变化 183
 - 4 相互依赖的精神气质 184
 - 5 难以捉摸的内在性 186
 - 6 一次被压制的变革 190
 - 7 理性主义和极权主义 192
 - 8 相互依赖与权威 193
 - 9 恐惧失败 195
 - 10 现代的相互依赖 198

- 11 变革传统的传统动力 198
 - 12 新乐观主义与方法 201
 - 13 新乐观主义与激进的政治重组 206
 - 14 新乐观主义与观念进步 207
 - 15 意识形态，中国中心论和民族主义 208
 - 16 新乐观主义与文化绝望问题 209
 - 17 新乐观主义与现代中国哲学的主题 212
 - 18 结论：毛泽东的成就与相互依赖的精神气质 216
-

注 释 221

译校后记 279

导 言

1 问 题

尽管人们担心会陷入斯宾格勒式的笼而统之的断言，近来对处于现代化前夜的晚期中华帝国文化的宏观讨论，仍然十分热闹。在研究中国的文献中，有关帝制社会的“价值体系”、“精神”、“世界观”、“意识形态”等等概念随处可见。这类概念中有相当一部分，作为分析问题的基线，不仅对于揭示其本国发展方向的中国思想家们，而且对于试图判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西方学者，都是十分需要的。费正清最近谈到，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关于他们自己在世界上自成一体的观念真象是一种宗教的信念”⁽¹⁾。显然，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去描述这一“信念”及其历史渊源。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太讲究学术的严格性，把孜孜以求的努力局限于能明确加以限定的那些课题中，而更应当力求从目前可资利用的各种散乱的观点

和材料中，发掘出尽可能多的意义来。

最近，学者们开始使用“政治文化”的概念来处理这一课题，这个概念有助于引导我们去注意宇宙观念和对待权威的态度之间的相互联系⁽²⁾。权威观念总是与自我和宇宙、自我和集体或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观念分不开的⁽³⁾。同时，权威观念给每个个体留下的怀疑传统规范的可能范围如何，也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马克斯·韦伯是第一个认真提出这一点的人。他指示我们去考察任何一个历史社会的文化是否提供了精神的“杠杆”，使该社会的秩序得以发生变革，或者使社会得以接受外部世界的变革观念。因此对于任何政治文化来说，具有核心意义的是那些决定着变迁样式以及它所期望的道德秩序的观念。

在这整个的探讨中，韦伯是把儒学纳入比较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的。这种杰出的并且至今仍然无与伦比的见解，一直起着主导作用。他的论点是，儒学“把人对于世界的紧张感减轻到绝对的最低限度……在儒家的伦理中完全没有……伦理要求与人类缺陷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引用儒学关于“人类天性在伦理上是善”的观念，来解释这种道德紧张的缓解的。上述观念也可以这样来表达：“个人在面对这个世界时，绝对没有与之抗衡的自主性。”⁽⁴⁾ 韦伯的观点，反映在S·N·艾森施塔特基于第二手文献资料进行的广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中。他认为，尽管“理”（宋明儒学的形而上学概念——译注）有某种超越性，但“停滞的……不能转化的……儒家思想”并不注重与现实政治制度相分离的道德秩序⁽⁵⁾。白鲁恂也持有类似的看法⁽⁶⁾。然而，韦伯在写作时，没有能注意到另一些学者的工作，他们从那时起即已致力于重新阐释儒家思想，使之更易于为现代观念所理解。韦伯关于儒学极其缺乏“对于世界的紧张感”的观念，与在现代中国人中影响日益增大的认为儒学传统“停滞不前”的科学主义幻想相

吻合。但是他对于儒学人性观念和道德生活观念的理解却显然是错误的，它确实是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一个显著例证。

最近出现一种与韦伯的见解多少有些不同的新观点，强调即便儒家人格没有“对世界的紧张感”，那么他仍以一种道德上的紧张感为特点。因为，儒家人格被一种需要依赖其社会上层以求得权威指导的沉重焦虑所支配。但是，这个几乎同时被美国的和中国的行为主义学者们所提出的论点，业已遭到尤其是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们的质疑⁽⁷⁾。行为主义者，很难与那些主张一种道德意义的“精神”是中国历史之根本的中国学术权威取得一致的见解。

2 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背景

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文化的宏观讨论，显然已经不仅同行为问题上的人文主义模式及行为主义模式的分歧纠缠在一起，而且也与各种哲学的和意识形态的争论纠缠在一起，在20世纪的中国以及西方，这种争论深刻地影响着关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各种流行的解释。对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分。张灏最近指出，许多面对本世纪困难局面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仅仅关切设计现代化发展战略问题，而且关切如何解决更持久更深广的关于痛苦和意义的存在主义难题⁽⁸⁾。他们思考这些问题的艰深程度，至今构成我们研究工作中的又一重困难。他们通过广泛自觉地吸收世界性的知识传统，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发展起一种新的批判眼光，其中许多人能够使用西方人为研究中国而提出来的分析概念。例如，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的朋友贺麟，1945年在昆明完成了一本回顾康有为（1858—1927）以后中国哲学发展的篇幅不大的书⁽⁹⁾。他在这本书中对一系